

柳宗元研究

王溪海 主编

王孝萱題



南海出版公司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专栏专辑

柳宗元研究：1980—2005

主 编 王 涑 海

南海出版公司

2006·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宗元研究:1980—2005/王涑海主编.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4

ISBN 7-5442-3388-X

I. 柳... II. 王... III. ①柳宗元(773~819)—人物研究—文集②柳宗元(773~819)—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K825.6-53②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6903 号

顾 问 陈建民 管天球 袁先友
题 字 卞孝萱
策 划 张京华

LIUZONGYUAN YANJIU:1980—2005

柳宗元研究:1980—2005

主 编 王涑海
责任编辑 杨 苏
装帧设计 南海高教出版中心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6568511(出版)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省蚌埠市广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44
字 数 114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3388-X
定 价 98.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龙序

永州地方不大,且处于湘南一隅,但历史悠久,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名播遐迩。九疑山下舜帝陵的赫赫圣迹,潇湘水边古代美人凄怨动人的故事,濂溪诞生的被誉为继孔孟之后的“第三圣人”周敦颐的五彩光环,更有朝朝暮暮与永州山水融为一体、在这里生活达十年之久的柳宗元。江山不幸诗人幸。作为一代有理想有远见的杰出政治家柳宗元,往往不为当朝权贵所容,后果必然是要从权力顶峰上跌落下来。他贬谪永州后,由庙堂之上到荒漠之野,现实巨大的反差使他经历了人生的强烈震撼,万般感触和他超越常人的才华结合在一起,就能迸发思想的火花和诗的灵感。生活处境是贫病枯寂的,但思想和精神却极为富赡而活跃。济世安邦的理想破灭了,但文思和诗情却汨汨而来。永州山水是最好的媒触,四百多篇震古烁今的宏文在这里铸就。永州是柳宗元人生的低谷,却是他思想和事业的顶峰。

当地的学府,早先的零陵师专,中改名为零陵学院,现更名为湖南科技学院,学校虽几易其名,但学府办的学报自创刊起利用柳宗元的精神遗产开辟的学术专栏“柳宗元研究”却一以贯之,坚持了25年,累计发表柳宗元研究学术论文约137篇,达百余万字,并且于2002年学报与永州市政府联合,成功举办了国际柳宗元学术研究会。一所地方院校,其主持者有如此的学术眼光和学术气魄,做出如此的学术盛举和学术业绩,难道不应该祝贺和称道吗?

作为展示学校教学和科研的窗口,高校是应该办学报的。但高校办的学报又往往千刊一面,为学术界所诟病。原因在于“小而全”,文、史、哲、经、政、法诸学科的文章,什么都刊载,不能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湖南科技学院学报利用地处永州所具有的学术文化资源的优势,办起“柳宗元研究”栏目,而且办得有声有色,这是打破千刊一面的局面、突出刊物特色和个性的有力举措。作为一所普通高校的学报,要想在综合性方面办出水平,恐怕是很困难的事。但举起“柳宗元研究”的旗帜,把它作为重点和特点,就能做到人无我有,这是林林总总的众多学报中的独特的“这一个”,有望在期刊之林中尽显“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效应。

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形容做学问的最形象、最恰当的话。做学问需要沉潜的心态,需要耐得住寂寞,在默默无闻中做点点滴滴的日积月累的工作。办学术刊物也是如此,需要长期积累,汇聚学术成果,逐渐扩大学术影响。“柳宗元研究”经过学报编辑部几届负责人一棒接一棒地不懈努力,经过学者们和编辑们共同长达25年的辛勤耕耘,到今天终成气候,成为国内柳宗元研究的一个重镇,撑起了一片学术天空。

作为特色栏目,“柳宗元研究”是成功的。它的成功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栏目的选题是有意义的,并且可持续发展。柳宗元既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又是具有进步美学理念的文学家,还是关心民生疾苦、怀抱清明政治理想的政治家。对于这样一位文化伟人、一座思想文化的宝库,可以从政治的、哲学的、文学的多学科视角进行交叉研究。随着时代和现实的变换,对柳宗元的丰富内涵,人们一定会有新的认识和开掘,其意义和价值就不管是历史性的。第二,栏目得到国内研究柳宗元的专家学者的青睐。在栏目中发表文章的作者队伍中,我们能发现像苏渊雷、卞孝萱、姚奠中、马积高、刘知渐、吴文治、王国安等这些大家的一长串名字,正是他们的有学术分量的论文奠定了栏目的学术品牌。当然,一些研究柳宗元的学术新秀在栏目中也崭露头角,这些“小人物”的成长得益于栏目对他们的培养。“柳宗元研究”是一面旗帜,团结在这面旗帜下的是国内研究柳宗元

的新老学者队伍。第三,栏目得到了读者的认同。一本学术期刊,一个学术栏目,编者——作者——读者,正是靠这三个“者”的良性互动才能形成学术生产力和产生学术影响力。由于学术期刊太多,仅大学的社科学报就达一千余种。我们可以正确地设想,作为一般的读者,他们不一定会去找《湖南科技学院学报》来读,但作为对柳宗元有研究兴趣的读者,他们一定会去找《湖南科技学院学报》来读,因为这家学报上的“柳宗元研究”是有分量的,是在别的名校名刊上找不到的。出现这种前景,正是栏目价值的体现,正是栏目开办者所追求的。

大学是现代社会的发动机,学报是大学的学术文化品牌。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专门学问的地方,大学办的刊物如果不高雅、不专门,就有辱门庭;学术研究是个性化的创新活动,大学办的刊物如果千刊一面,低水平重复,就丧失了学术的基本品格。但大学是分层次、分类型的,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办学目标和办学方式。对大学学报进行分层管理、分类指导是绝对必要的。不在同一个层次、同一个类型上的刊物是难以比质量、论水平的。但我们可以就特色说成败,以品牌论英雄。《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的“柳宗元研究”是该刊的眼睛,是该刊的亮点,也是读者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可以说形成了特色,形成了品牌。湖南科技学院是一所普通本科院校,但该校学报的栏目“柳宗元研究”却不普通,其影响超过了该校,超过了该校学报。换一个角度看,正是“柳宗元研究”提升了该校的知名度,扩大了该校学报的影响力。学报以栏目显,学校以学报名。所以,不在于是大校还是小校,是名刊还是普通刊,关键在于出特色,创品牌。有了品牌,有了特色,世界便承认你,你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无论是尖端的东西,还是简单的东西,无论是我们学报界通常讲的第一世界学报,还是第二、第三世界学报,在创品牌、出特色上,上帝都赐给了发展空间和公平竞争的机会。我相信学报界的同行朋友会从“柳宗元研究”栏目中获得有益启示,展示自己的求异思维,出不同的招,打不同的牌。主管部门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报也应制订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考核评估指标。不同层次、不同特色的学报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学术期刊生态群落。在这个群落中,各类期刊都有它的生存价值。金字塔的塔尖固然最吸引眼球,但塔身和塔座也应给予必要的关注。

一个办了25年的栏目,它推动了国内柳宗元研究,反映了国内柳宗元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发展轨迹。于今把这些成果汇编成册,出版《柳宗元研究:1980—2005》专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后续工作,应看成是由专栏到专书的再提升。从如何拓展历史文化名人的研究,从如何办好学报和特色栏目,还是从如何实现书刊互动,湖南科技学院学报“柳宗元研究”栏目带给人们的启示意义是多方面的。

是为序。

龙协涛

2006年1月10日

于北京大学燕北园寓所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学报》原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理事长)



本书是一批热心柳宗元研究的学者们连续二十五年努力所积累的业绩。《湖南科技学院学报》(以下简称《学报》)及其前身《零陵师范专科学校学报》自改革开放初的1980年直到今年二十五年间,连续开辟“柳宗元研究”专栏,发表论文百余篇。这些论文的作者几乎涵盖国内研究柳宗元的著名学者,还有几位外国和台湾的柳宗元研究专家。这样,呈现给读者的这本文集,就大体体现了我国目前柳宗元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二十五年间有关研究领域进展的轨迹。文集中更辑录了该学院和永州市本地开展柳宗元研究的论作,展示了地方上开展历史文化名人和乡邦文献研究的实绩。因此这部文集无论是作为总结性的学术成果,还是作为文献资料,都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柳宗元作为古代卓越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成就与贡献众所周知,本书辑录的文章即有对这些的详细阐发,毋庸赘述。这里仅就《学报》支持与推动柳宗元研究的意义和研究方法提出一些看法,仅供参考。

首先,一所高等学校的《学报》坚持多年开辟“柳宗元研究”这样的学术研究专栏(该《学报》还开辟另外一些专题学术专栏,是其一大特色),是很有见识、很有意义的。

学术研究对于提高学校教学和科研质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提高科研水平更关系到高等学校办学的生命。如“柳宗元研究”这种学术专栏,一方面可以鼓励、推动校内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可以吸收外部研究成果,对于提高本校教学、科研质量必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二十五年办好一个专门性的研究栏目,坚持不易,我们局外人除了表示赞赏,更对于历年担任编者的各位,对于支持《学报》工作的担负学校领导责任的各位表示敬佩。

扩展一步说,高等学校注重本地先贤与乡邦文献研究,是理应担负起来的职责。但是做好这方面工作,限于主、客观条件,难度很大。据个人了解,永州的柳宗元研究当初也是起步维艰,只有当年零陵师专领导与教员中的几位热心人操持。他们克服许多困难,召开学会,编印资料,一步步做去,渐呈规模。到如今作为地方高校的湖南科技学院,已经成为国内柳宗元研究的重镇之一,这就不仅对于办学,更对于地方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这也是值得称道的。

而从更开阔的角度看,开展柳宗元研究,乃是继承历史遗产、发扬古代优秀传统文化、进而推进社会文明建设、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工作。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激烈震荡中,人们中间相当普遍地存在理想的缺失、信念的动摇、价值观的混乱等等精神世界的弊端,已经成为干扰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缘由之一就是多年来对待民族传统和历史遗产的偏颇:过多粗暴的否定、简单化的批判、形而上学的漠视,等等,使得祖国优秀历史传统中形成的价值观、伦理观动摇和破坏了。本来历史上先人们创造了大量文化宝藏,积累了丰富精神财富,理应作为今人的借鉴和楷模。对这些采取否定、漠视态度,人们在精神上也就失去了一种重要的依托和标准。永州这份《学报》二十五年来所坚持的柳宗元研究,从更开阔的角度看,正是在作弥补缺失、纠正偏颇的工作。

《学报》二十五年来不计功利、持之以恒地坚持支持、做好这一工作,体现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的。

继承和普及历史遗产,进行科学研究是不能急功近利的。近些年许多地方普遍开始注重宣扬本地文化名人了。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说法,叫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利用文化遗产来促进经济

建设,也算是符合社会进步的“策略”。但是如果做这方面的工作单纯着眼于经济效益,例如为了招商、旅游等等,则是一种短见和偏颇了。文化工作理应具有更为广远、也更为重大的意义和价值。这在下面还将说到。还有一种做法是片面地追求“现实意义”,“古为今用”,利用古人、古事比附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以古喻今,借古讽今,仅仅是后人利用历史遗产的一种方式,但不应是普遍的、根本的方式。比如就柳宗元研究来说,柳宗元反对分裂割据,人们借用来讲国家统一安定;他反对天命鬼神,人们用来宣扬反迷信;他主张“官为民役”,人们用来讲“以民为本”,这些在一定意义上都有合理的一面,也确实突显了积极的现实价值。但古人所处历史环境不同,思想体系不同,这样的比附只在一定意义上是合理的,而且应当加以具体分析。更不是所有的优秀历史人物、历史文献都是可用来做现实比附的。如果片面追求所谓“现实意义”,把这种做法当作唯一的方法,则难免牵强曲解,削足适履,以至歪曲古人,最终是把历史遗产贬低以至庸俗化了。

历史名人,扩展开来讲,历史遗产,具有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实际上这种历史价值与意义本身就体现了他们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柳宗元研究为什么值得珍视?最主要的不在它今天可以帮助招商引资,或者用来隐喻现实,而在柳宗元和他的作品自身的宝贵内涵。柳宗元本是唐代一位出身统治阶层的官僚文人,生活、活动在专制政体之下。当时唐王朝社会正在急剧走下坡路,国是日非,矛盾丛生。他怀抱着高远的政治理想,不顾身命,不惧艰危,力图改变危局,结果受到腐朽、保守势力的严酷打击,被流放到当时还十分荒僻的永州。而给他定罪的正是他怀抱耿耿忠心的朝廷。在永州漫长的十年,他身为流囚,居无定所,百病缠身,却以极其坚定的意志,潜心于国家政治、社会历史、自然哲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他又发挥杰出文才,进行文学创作,写出流传千古的优美诗文,同样获得卓越成就。在极其艰难困顿的条件下,他凭借自己坚韧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实现了人格的一大转变,由一个政治斗争中怨抑退屈的牺牲者、失败者拼搏而成为思想战线、文学领域的创造者、胜利者,从一个供奉朝廷的年轻官吏,成长为代表一代思想学术和文学创作成就的文化伟人。

在永州成长起来这样一代伟人,是永州的幸运,是中国的幸运。他是历史留给今人的瑰宝。他留下的遗产可概括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他的作品,包括学术和文学创作两个领域的成果;柳宗元的学术理论作品涵盖极其广阔,内容极其丰富,包括哲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美学等诸多领域,柳宗元在这诸多领域都创造出具有巨大价值的成果,成为他留给后人的珍贵的思想遗产。其中有些部分可以“古为今用”,直接拿来作今人的借鉴;又有更多的内容则作为历史上的文化积累,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理论资源。至于他的那些美轮美奂的文学作品给人以教益,提供人美感,则是不言而喻的。

他留给今天遗产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他的人格。柳宗元是与常人一样的血肉之躯,他行、住、坐、卧,经受常人一样的欢乐、痛苦。我们读他的作品,会感受到他受到迫害、压抑之下的痛苦、悲哀、牢骚、失望、走投无路而痛不欲生,等等。但他没有退缩、没有颓唐,而是不懈地追求,顽强地拼搏,把艰难困顿的生活变成波澜壮阔的奋斗过程,在寂寞荒凉的南国,在贫病枯寂的处境之中,创作出震烁古今的辉煌业绩。他在走向颓败、堕落的社会环境下,代表了一代知识精英的独立的、批判的思想意识,他的身上体现了自古以来中华文明所积累的价值与良知。他的品德、意志、人格,他的才华、感情、能力,成为不朽的榜样,具有极大的魅力,给人以鼓舞,激发人警醒。多少志士仁人引他为同道,又有多少人面对他这样人的历史存在而感到愧悔。这种伟大的人格,对于今人更是难以估价的精神遗产。

我们常说,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这不应是一句简单的口头禅。源远流长的历史给今天的中国人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是世界上其他民族鲜有其比的。柳宗元是无数伟人中的一位。这无数伟大人

物伴随着中国历史前进,也伴随着今天的我们。我们理应对他们表示谦恭的景仰和衷心的赞叹,研习他们的著作,学习他们的人格。面对着这些伟大的先人们,我们时时感受到沉重的责任和巨大的压力:这一代人要奋发努力,不负一代代先人的拼搏、奋斗,努力创造出更辉煌的业绩。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永州《湖南科技学院学报》坚持二十五年开展关于地方先贤和乡邦文献的研究,是值得称道的。仅以浅陋弁言,聊表敬贺之意,并祝愿《湖南科技学院学报》再接再厉,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孙昌武

2006 年新春初度

(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中国柳宗元研究学会会长)

唐 序

我校柳宗元研究及学报设“柳宗元研究”专栏,从198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26年历史了。26年来,风雨兼程,历尽艰辛,从未懈怠。其结果是培养了人,写出了文,出版了专著,也亮出了柳宗元研究的品牌。最终目的是推进了文学研究事业和永州旅游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永州和学校的知名度。为了给26年来的研究作一个小结,《湖南科技学院学报》推出一个《柳宗元研究:1980—2005》专集。该《学报》主编张京华教授约我写几个字,把开设柳宗元研究专栏的初衷与基本过程表述出来,那原因是我是《零陵师专学报》(《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的前身)和“柳宗元研究”专栏的初创人。其实,我是教语言学的,对柳宗元的作品没有做多少研究,只是感兴趣而已,写不出有分量的东西。当时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职务上的原因,教务科主要抓科研,学报主编要办出特色,如此而已。

《零陵师专学报》(2001年后逐次更名为《零陵学院学报》和《湖南科技学院学报》)创办于1980年。创办《零陵师专学报》的目的在发刊词中有明确的表述,一是开展科学研究,交流学术成果,活跃学术空气;二是总结师专和中学教学经验,把师专和中学教学结合起来,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影响,既提高师专的教学质量,又更好地为中学教学服务;三是通过学报这块阵地,“努力培养出一大批又红又专、适应四个现代化需要的教学科技人才”。目的明确,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把《零陵师专学报》办出水平、办出质量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能跟名牌大学的学报比,也不能跟一般本科学校的学报比,因为相差太远,没有基础比,硬是要比,那结果只能是偃旗息鼓,收兵回转。但是,我们也不甘于无所作为,一筹莫展,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有一点志气、有一点追求的。我们既然把《零陵师专学报》办起来了,就要把她办好,办出水平,办出自己的特色来,以特色取胜,通过特色求质量,可见《零陵师专学报》的生命力、影响力全在于特色。咬住特色不放,充分展示特色的内涵和外延。这就是我们当时办学报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什么是《零陵师专学报》的特色?简言之,就是突出地方性。地方性要常抓不懈,期期有文章。关于这一点,发刊词有一段文字作了表述:“《零陵师专学报》要从现有的实际情况出发,扬长避短,力争办出自己的特色。本刊除发表一般的学术论文外,还要逐期发表一些能体现零陵地方特色的文章。文科可研究柳宗文、周敦颐、何绍基、李达等生平活动或学术思想,可调查零陵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风俗;理科研究论文也要注意零陵地区的自然环境、矿产资源,优选、统筹等方法在我区的实际运用;总结中学教学经验,也要从零陵地区中学各科教学实际出发。总之,本刊既要办出共性,更要办出个性,使之不失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为了突出地方性,当时设计了几个专栏,如“柳宗元研究”、“零陵文化研究”、“零陵风俗调查与研究”、“零陵方言调查与研究”、“零陵经济调查与研究”、“零陵中学教学经验谈”等。

在众多的地方性专栏中,柳宗元研究成了主要视点,摆到了突出的位置,也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和非常大的力量。那原因是:一、柳宗元是唐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柳河东全集》中相当多的文章是在永州写的,写的是永州的人和事、山和水、风土和民情,很有文学影响和社会价值,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中名家,在文学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知道柳宗元的人也不少。永州人研究柳宗元既责无旁贷,又得天独厚;政治理想受挫后,蛰居永州,历时十年,对当时官场的腐败和民间的疾苦,有直接的体验和切身的感受,其政治观、道德观更趋于进步,借古鉴今,古为今用,何乐而不为。这叫做有东西可研究,也确实值得研究,只

要认真研究,就一定能出成果。二、高等学校的教师应该是研究型的教师。有研究才有发现,有发现才能出成果,有了发现和成果,才能创造性地进行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培养这样的不脱岗的教师应当从哪里入手呢?当然我们可以鼓励他们研究李白、杜甫、白居易、茅盾、郭沫若等;也可以支持他们研究歌德、雨果、高尔基、托尔斯泰、塞万提斯等,这当然也是必要的。但引导一部分人研究柳宗元,我们认为更直接、更现实、更有实在性。遗踪旧址可以考证,作品中涉及的内容可以调查,散落在民间的善举义事近民传言可以寻访,用不着远道奔波,花钱求证,写出的东西相对而言可信度也更高。从易入手,易出成果,有了成果便能激发热情、增强自信,一发而不能收,创造出更多的成果,研究型教师也就培养出来了。这是第二个原因。三、突出特色,取得成果,为零陵师专在高校和学术界争一席位。新建高校要在高校和学术界有点名气,争一席位,既要靠你的高质量教学水平,又要靠你的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教学我们自有安排,而且连续拿得三个国家级大奖,成为当时师专的领头雁。科研我们想通过特色研究,尤其是柳学研究,产出成果,出有水平的成果,让专家和学术界认同。26年来,这一愿望也趋于实现。地方高校要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就要选准课题,打造出有亮点、有吸引力的品牌。我们认为柳宗元及其作品是一份很有品味、很有分量,又为永州特有的文化资源,通过对柳宗元的研究,让社会认识柳宗元,认识永州,借以宣传永州,提高永州的知名度,把有识之士和经济界的达才吸引到永州来,搞旅游开发,办经济实体,推进永州的经济发展和进步。这是第四个原因。这些认识在当时是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刻的,为柳宗元研究及其专栏能持续办下去提供了思想认识保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思想认识是正确的,但是要把这种认识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并取得柳宗元研究的好成果,还得要有一定的条件和较好的学术环境。在这方面,我们当时考虑了并且实施了如下一些工作:一、广交朋友,形成柳宗元研究者的联系网络。当时我们决定召开全国性的柳宗元学术研讨会,以会结友,以学会友,广泛结识省内外柳文研究专家、学者和教授。经过较长时间的组织准备、资料准备和记文准备,于1981年10月在零陵师专召开了研讨会,到会专家、学者和教授有吴文治、姚奠中、苏渊雷、马积高、刘知渐、孟庆文、张玉玲、龙震球、曾应怀、赵民伊等90多人,收到论文80余篇。大家对研讨会反映强烈,评价很高,更为可喜的是把我校的柳文研究工作者与全国柳文研究专家、学者和教授联系起来了,为今后互通信息、互交资料、互递成果,你来我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柳宗元研究”专栏开辟了高质量的稿源。二、建立专门研究柳文和专抓柳文研究的机构。当初,我们建立了挂靠中文系的柳文研究室,由柳文研究学者任主任,其经费列入学校预预算计划。研究室既有自己的课题研究任务,又有组织和管理柳文研究的责任。后来,研究室从中文系独立出来,直接由学校领导管理;再后来,又将研究室更名为研究所。接着,我们又成立了校级性的柳宗元研究学会,这个学会经过扩大重组,更名为永州市柳宗元研究会,把全市柳宗元研究工作者和政府部门对柳宗元研究有热情有成果的官员也吸纳了进来,阵容壮观了,活力增强了,研究成果更丰富了。尤其是官员学者和学校学者的结合,使得研究会经费渠道更畅通,活动范围更广阔,生命力和影响力也更大。这个研究会于2001年成功地举办了世界性的柳宗元研讨会,办了专刊,出了专集,并以团体身份成了全国柳宗元研究会会员,还有两名同志担任该会副会长。这不仅提高了永州研究柳宗元的知名度,同时也为“柳宗元研究”专栏开辟了更为活鲜的稿源基地。三、建立资料室,设立展示柜。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建立了柳宗元研究专科资料室。资料室首先把《柳河东全集》的不同版本、各种资料集中起来,本校缺漏的就到全国有关图书馆、研究厅去复印,尽量求其全,供大家参考。我们还在柳庙设立了展示柜,把永州人研究柳宗元的成果,包括论文、论著、评释展示出来,供游览者参阅,加大宣传力度。此外,我们还与政府配合,逐步修复柳宗元的遗址,并在遗址所在地竖碑说明。这既是对游者的引导,以便加深认识,又是对市民的告示,要保护好遗址。四、约外稿、组内稿,形成丰

富稿源。这一举措,在初研时期尤为重要。一方面为了解决稿源不足而专栏又要长期站立的矛盾,另一面也是借外力以推练内功。约外稿主要是约全国有名的柳文研究专家、学者和教授,如吴文治、苏渊雷、姚奠中、马积高、王一民、刘知渐、张玉玲、周庆义、卞孝萱等,他们的文章有深度、有新意、有独特的见解,发他们的文章既可以提高学报“柳宗元研究”专栏的质量,又可以引导和推进本校学者对柳文的研究。组内稿主要是为了培养本校柳文研究工作者,自己的专家出来了,稿源就成了活水。实践证明,这一做法对26年来坚持设立“柳宗元研究”专栏是非常必要的。学报办了26年了,主编也更替了4个,但“柳宗元研究”专栏却从未更替,那原因,恐怕与咬住上面4条不放不无关系。

回顾26年来柳文研究的历程和“柳宗元研究”专栏开办的情况,我们欣慰地看到,柳宗元研究的学术空气更深了,组织机构更健康了,研究成果更丰富了,研究队伍也不断扩大了,为永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据初步统计,专栏中共发表柳宗元研究论文123篇,其中外稿43篇,占35%左右,内稿80篇,占65%左右。此外,还有一大批内稿发在其他专刊、专期和报纸上。出版专著12部,如《柳宗元社会心理思想研究》(陈雁谷)、《柳宗元旅游思想研究》(陈雁谷)、《徐柳研究文集》(陈雁谷)、《柳宗元研究》(何书置)、《柳宗元与永州》(杜文智)、《一代宗师柳宗元》(翟满桂)、《柳宗元永州诗歌赏析》(吕国康、杨金砖)、《柳宗元与永州山水》(陈松柏、蔡自新)、《柳宗元诗文研究》(刘继源)、《柳宗元永州山水散文鉴赏》(黄伯荣)、《柳宗元学术研究论文集》(蔡自新)、《柳宗元诗文教与学》(吕国康)等。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研究已经由必然步入自由,由篇什跃入综合,由单体进入连体,由论文跨入专著。大而言之,涉及到柳宗元的文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语言思想、旅游思想等;小而言之,涉及到诗歌、散文、辞赋、游记、寓言、传说文学等。其趋势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科学,也越来越有深度。柳宗元研究丰富了“柳宗元研究”专栏的稿件,“柳宗元研究”专栏的设置又促进了柳宗元研究,两者互为因果,相谋益新。在队伍培养方面,除了老一辈像陈雁谷、杜方智、赵民伊、刘继源、何书置、龙震球、曾应怀等之外还涌现出了一大批破土而出、成果卓著的新秀,如翟满桂、杨金砖、陈松柏、蔡自新、吕国康、夏卫平等,真可谓群星璀璨,光耀神州。我们可以乐观地预想,有了这样一批年轻有为、执著追求,又富于创造精神的柳宗元研究工作者,尤其是现任主编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功底很厚,理论很深,联系面又很广,在他的谋划下永州柳宗元研究将会出现更加灿烂的局面,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而“柳宗元研究”专栏也会因此办得更加火红,更加富于特色,更加生机勃勃,也更为学术界所瞩目。

唐朝阔

(本文作者为湖南科技学院教授,《湖南科技学院学报》首任主编,原零陵师专校长)

柳宗元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的一位望族世家,至柳宗元时,家境虽有些破落,但门风并未衰败,仅其祖上遗留下的所藏赐书就达三千卷之多。再加上柳宗元从小性敏好学、博闻强志,21岁便进士及第,26岁考取博学弘词科。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由集贤殿书院正字、蓝田县尉、升至监察御史里行,可谓是仕途畅达。但是,由于安史之乱后所引发的朋党纷争、藩镇割据、宦官横行,大唐王朝已日渐变得衰微凄凉、凋败荒废、风雨飘摇、日薄西山。于是,壮志雄心的柳宗元与韩愈联手倡导古文运动,与王叔文并肩推行政治革新,企图从学风上、仕途上有所作为。然而,正当事业日进的时候,由于保守势力的反扑和宪宗继位,革新成了结党营私的罪证,从而使其从权力的巅峰上跌落下来,并连遭贬谪,最后困死贬所。

但是,柳宗元于永州十年的苦难生活中,使他触及到了社会的黑暗与朝廷的危机,深深地体悟到了民不聊生的痛苦。他在风雨如晦的长夜里,并没有因仕途的坎坷而消沉下去,而是凭一盏昏黄的油灯与一支普通的狼毫笔,写下了大量的流传千古的诗、文、状、表、志、记类文字。也正因这些文字,奠定了他作为一位不朽的文学家、思想家的地位,成为历代学者和文人所景仰、敬慕的对象。

关于永州柳学的升起,大约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时,由于百废俱兴,在文学界、思想界掀起了一股“解放思想,勇闯‘禁区’,提倡标新,鼓励争鸣”的思潮。在这场思潮中,《零陵师专学报》在唐朝阔主编的倡导下,率先开辟“柳宗元研究”专栏,大力开展柳学研究。岁月无痕,时光易逝,从陈雁谷先生的《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刍论》(1980年第1期)发端,几经风雨,随着学校的不断升格,学报也由《零陵师专学报》相继更名为《零陵学院学报》、《湖南科技学院学报》,但是,“柳宗元研究”栏目一直保留着,并有日益壮大之势。

在过去的20余年里,该栏目共刊发各类柳学研究论文120余篇,协助组织过两次有较大影响的专题研讨会,出版学报专辑一期,出版柳学研究著作12部,编印《永州柳学》5期。

检点“柳宗元研究”专栏中所刊发的120余篇文章,其中湖南科技学院内稿52篇,来自全国各地的外稿为70篇,内稿的比例约占2/5。从时间上细而分之,1995年以前发刊的38篇文章中,内稿为26篇,外稿只有12篇,并且这12篇中有7篇属于1981年全国柳学研究学会交流论文,可见当时主要以内稿为主,当然这与学校柳何研究室同仁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1995年以后,据统计该栏目共刊发的80多篇文章中,外稿50余篇,内稿只有26篇。内稿比例有下降之势,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学校机构调整,柳何研究室被精简掉了,再加上部分老一辈研究人员的相继退休,从而,院内的研究力量有所下降;二是刊物的影响力愈来愈大,来自全国各地的柳学研究方面的稿件日渐增多,于是,该栏目基本上转至以外稿为主。从作者撰稿情况上看:内稿主要集中在龙震球(5篇)、陈雁谷(11篇)、何书置(14篇)、翟满桂(4篇)、夏卫平(6篇)、陈松柏(3篇)等五位先生上,他们的文稿量基本上占去了内稿总数的4/5;外稿来源较广,如重庆、辽宁、兰州、济南、南京、长沙、柳州等地均有稿件惠寄本刊,但是,主要以柳州为主,在外稿的70篇中,柳州王一民先生有9篇,谢汉强先生有2篇,卢红、张静各1篇,占总外稿量的1/5左右。从研究的内容上看,涉及柳宗元的文学创作、社会心理、哲学思想、人文品格等方面。下面就各专题的内容作一客观上的扫描,并尽量不妥自加入自己的任何观点,以力图保证综述的真实性。

一 柳宗元的文学理论与创作

柳宗元的“文以明道”的文学理论与那模山范水的创作风格,奠定了他作为文学大师的基石,使他跻身于唐宋八大文学家的行列,他的诗,“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幽峭明净,自成一家。因此,柳宗元显赫的文学成就一直为千百年来柳学专家们所关注。

关于对柳宗元诗歌成就方面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的重点。本专栏共刊发诗歌研究方面的论文14篇,占总文量的12%。从时间上看,有6篇发表于80年代初期,尔后,在诗歌研究上则日见式微,这也许与当今中国文坛的视点有关。由于当时刚刚结束“文革”动乱,往日那种高压一统的霸权话语被打破,残酷的现实使人民日渐从疯癫的幻觉中醒悟过来,不得不去进行灵魂的忏悔与行为的反省,于是,诗成了当时社会最大的宠物,人民企望从诗中获得新的语言之根。从而,对柳宗元的诗歌艺术的研究成了当时推动整个时代诗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视点。龙震球先生撰写了长篇论文《柳宗元诗歌初探》,全文达3.5万字,分四大部分,该论文对柳宗元所处的时代及思想,柳宗元的诗歌渊源,柳宗元的诗歌分类概况,柳宗元诗歌的艺术风格进行了较详细地研究。行文虽然冗长苦涩,但其对事实的罗列,对资料的引证可谓宏博。该文曾分节刊发在《零陵师专学报》1981年的第1期和第2期上。辽宁大学孟庆文先生的《柳宗元诗文简论》(1981年第2期)中提出了“柳宗元诗文中一个进步的思想内容是:肯定天是自然的,坚持天人相分,揭露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华东师大苏渊雷教授的《论韩柳、刘柳诗文风格异同及柳的独创性》(1981年第2期)一文,从历代文论和诗话上对三家诗文高低深浅进行了梳理,最后指出“柳谪居十四年,忧患之余,学养皆进,深得静以养志之乐;韩光显后,一味为君统粉饰,不免与世周旋,且为门弟子所疑,其躁进之病未除,匪独于道未纯;诗文深度,似亦较柳有差”。可谓灼见也,其实,这里隐约地似乎喻示了“御用文化”与“苦狱文化”之别。古谚云:“文章憎命达。”山西大学姚莫中教授的《辞赋中的奇葩——柳宗元卓越的文学成就之一》(1981年第2期),钟来因的《柳宗元〈江雪〉、〈渔翁〉新解》(1982年第1期)都很有新意。

关于对柳宗元文学思想的研究。相继刊发了湖南师大马积高先生的《论柳宗元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1981年第2期),重庆师院刘知渐先生的《略论柳宗元的文道观》(1981年第2期),零陵师专何书置先生的《试论柳宗元的文学批评观》(1981年第2期)等文章。

关于柳宗元传记文学方面的研究。相继刊发了零陵师专陈俊昆老师的《柳宗元传记文学的特点》(1988年第4期)、金仁先生的《〈谪龙说〉与〈河间传〉钩沉——兼与卞孝萱先生商榷》(1998年第1期)、霍旭东教授的《谈〈段太尉逸事状〉的写作》(1999年第1期)、王一民《试论柳宗元〈王叔文母刘氏志文〉》(1999年第4期)。

关于柳宗元在修辞理论方面的研究。零陵师专唐朝阁教授的论文《词正 言畅 道明——试论柳宗元的修辞理论》(1989年第2期),提出了与郑子瑜先生在《中国修辞史稿》中相异的观点。《中国修辞史稿》中认为“柳宗元反对丽辞”,而唐朝阁先生则认为:“柳宗元反对的是那种逆于‘道’的‘丽辞’。”并提供了较为翔实的佐证材料:“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闾诞,以炳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井陷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章以明道,是故不苟为炳炳烺烺、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因此,“柳宗元反对的是文不逮意、以文为戏的‘丽辞’”,而并不反对“意深文茂、情信辞巧的‘丽辞’”,进而得出“言而不文则泥”的修辞原则。

王一民先生的《柳宗元对先秦汉语的继承和发展》(1996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在“载道”“明

道”上,韩、柳两家都扬弃了汉魏六朝的骈丽浮华的文风,皆以崇尚先秦古文的质朴自然为要务;但在语言文字上却又互有差异。如韩愈主张“惟陈言之务去”,“词必己出”,“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而柳宗元则直接从先秦古文中去吸取营养,继承精华。王一民先生从《辞海》语词分册及增补本中,统计出了191条引自柳宗元文章的词条,并指出在这些词条中有许多是直接化解先秦汉语而得。

尚永亮先生的《借古人以自抒怀抱——说柳宗元的两首咏史诗》(2001年第1期)、翟满桂教授的《柳宗元在永州的心境与诗歌创作》(2003年第1期)与夏卫平先生的《试论柳宗元种植诗的价值》(2003年第4期)等文章,从作品本身出发,进行了细致而独到的分析,廓大了研究视野与研究深度。

二 关于哲学思想的研究

柳宗元所生活的年代,佛教十分昌盛。因此,他自幼便受佛的影响。尤其是贬谪永州后,虽身为司马,实与囚徒无异,不仅活动遭受监视,而且居无定处——官衙没有提供憩身之所,只得借住在永州龙兴寺的一间阴暗潮湿的西轩里。柳宗元曾于《永州龙兴寺西轩记》中对此有所提及:“永贞年,余名在党人,不容于尚书省。出为邵州。道贬永州司马。至则无以居,居龙兴寺西序之下。”从此,他日夜置身于沙弥僧侣之中,耳濡目染、木鱼声声、梵音缭绕,再加上本身仕途迷茫,心情苦闷,于是,对佛学的笃信不仅是柳宗元客观现实的生存需要,也是内心深处心态调节的心理需要。但是,他作为入世的儒家士子,食着朝廷的俸禄,他的理想、他的职责该是济民于水火,救国于困厄,明君于歧途,对道统、对君王、对百姓应该是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是心中的使命。于是,他无法像僧侣那般逍遥自在,但又无法舍弃佛的自由境界。“入世”与“脱俗”两律背反,“现实”与“理想”相互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柳宗元提出了“统合儒释”的主张。关于这一主张,龙震球先生于《我对柳宗元“统合儒释”的肤浅看法》(1986年第2期)一文中列举了六点理由:其一,在孝道上无差异;其二,在理论支点上相一致,儒学所遵循的《易经》、《论语》与佛经有相通之处;其三,在处世方法上为一脉,儒家主张安贫守俭,佛教主张“四大皆空”,不以功名利禄为念;其四,佛教与孔、老、墨、商一样“皆有以佐世”之妙用;其五,佛教的“虚静”与儒家的“生而静者,天之性也”不谋而合;其六,在“人性善”上儒释无区别。

何书置先生的《柳宗元在永州与佛教的关系》(1987年第2期)及张一川先生的《“刚以柔通”与“圆其外而方其中”——论柳宗元立身行世之道》(1988年第2期)等文章中,对柳宗元的儒释思想进行了较详细的对比,认为柳宗元在永州的好佛,除了从佛教那里获取精神安慰与解脱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统合儒释,用以佐世”。因此,也许正是这种原因才使得柳宗元对佛喜好而不沉溺、褒扬而不迷信、执著而不盲从。他将佛归之为“百家”之一面进行文化的审视。

关于这一问题,王一民先生也曾撰文《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历史背景》(1995年第1期),从五个方面作了研究。即“初唐至中唐佛教发展的概况;初唐,佛教传播的起点甚高;许多僧人智力不凡;等而下之的佛徒流亚;柳宗元‘统合儒释’是上策还是下策?”这些问题的探讨,无疑是对柳宗元的哲学观点的研究是一大收益。

三 柳宗元的思想变化情况

柳宗元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文学家、思想家,是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的中坚人物。因此,对其思想情况进行研究的文章较多,共刊发这类论文近20篇。曾应怀先生于《也谈

柳宗元被贬后的政治态度》(198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柳宗元在被贬前后政治斗争的形式是有所不同的,但政治态度并没有什么变化。”文章认为柳宗元被贬至永州后,虽然不能直面人生地去参与革新,但仍以笔为器,直指社会的阴暗处。譬如:《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著名哲学篇章,把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经济上他一面揭露豪强地主把繁重的赋税转嫁给贫苦劳动人民的丑恶事实,一面提出“正经界、核实名”、“平均赋税”的主张,以限制豪强地主的兼并活动。在政治上,他指出官吏不是“役人”而是“役于人”。在人才选拔方面,强调任人唯贤。一切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

赵民伊先生撰文《柳宗元贬永期间思想生活的变化》(1981年第2期),对柳宗元贬永期间的心情状况与作品情况进行了研究,从而得出柳宗元贬永期间思想生活的“三个阶段”说:贬永前期(永贞元年至元和三年)苦闷而激愤;贬永中期(元和四年至八年)刻苦以自励;贬永后期(元和九年至十年)欣慰而失望。贬永中期,是柳宗元文思泉涌的时期,其流传的作品中,最有价值的绝大部分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赵民伊先生认为这与柳宗元贬永中期的心境日渐平静而刻苦自励有关,因为元和四年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谓“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明显地可以看出柳宗元的审美取向与价值取向已发生变化。

针对赵民伊先生论文中所提出的“三个阶段的论据问题”与“永贞元年至元和十年唐室‘朝政是非常混乱的’的问题”,阿痴先生提出了质疑。其《也谈柳宗元贬永期间思想生活的变化——与赵民伊先生商榷》(1981年第2期)一文中列举了大量可供商榷的事实,最后认为分三阶段不符合生活逻辑。

关于柳宗元的忧患意识,陈松柏先生曾撰文《宣室无由问厘事 周南何处托成书——柳宗元在永州的忧患意识》(1994年第1—2期合刊),对此进行了专题探讨。文中认为:柳宗元由一帆风顺跌落到命途多舛,由繁华京都贬逐到南蛮荒野,由仕途权人落魄成阶下罪人,这种人生的突变、心灵的交困不得不使其忧患于心,对人生价值进行深度的思考。也正是这种心系国家、民族危安的本真的忧患,才使其“日趋成熟,日趋臻达,日趋深刻,也日趋发奋,终于创造出顺境中不可能有的成就”。

柳宗元原本是壮志凌云一心改革,却落得个贬谪永州的结果,生命的荒废与时光的虚度使他心生一种犹如屈原般地怀才不遇之慨,一身凛然的正气只能压抑成内心深处的郁闷,不敢宣泄,但又不能不宣泄,于是,柳宗元在永州写了大量有关“愚”的文章。如:《愚溪诗序》、《愚溪对》、《八愚诗》等等,大书特书其“愚”之境。对此,吕国康先生特撰文进行阐释,其《柳宗元“愚”说的思想内涵》(1998年第4期)一文认为:柳宗元的“愚”说,是“讽喻时弊”,是对“愚、智不分的现实”表示莫大的愤慨与反讽;是柳宗元“大智若愚、外愚内智”的一种自我写照,是他斗争的一种策略。

四 柳宗元的教育思想与社会心理

柳宗元在教育上推崇“孔子之道”,孔子“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的训条对他影响至深。因此,在教育实践中与韩愈之《师说》的主张大相径庭。韩愈鼓励后学上,旗帜鲜明地宣扬师道;而柳宗元则认为韩愈在做一件蠢事:“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以是得狂名。”但是,柳宗元真的不为人师吗?对此,陈雁谷先生相继发表了《柳宗元教育思想刍议》(1980年第1期)、《试论柳宗元有关师道的心理品质论述》(1988年第4期)等文章,以较为充分的材料论述了柳宗元“不好为人师”的缘由,并对柳宗元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探讨。

陈文指出:“柳宗元是避开世人诟骂,谢绝为师之名,而行为师之实。”正如柳宗元《答严厚舆秀

才论为师道书》中所云：“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柳宗元的教育思想融会在他的师道、人才的选拔、学习内容、教学方法上。在师道上，柳宗元认为教师之所以成为教师，是因为他有一种别人不可能代替的特殊职能，这就是能传“其所不可传者”。可见在柳宗元的眼里，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为师，为师者必须“专而通、新而一”。在招收学生上，柳宗元的观念更为独到，他认为：“师儒之席，不拒曲士。”如“俞、扁之门，不拒病夫；绳墨之侧，不拒枉材。”

此外，陈雁谷先生还独辟蹊径，将研究的视角投向到了社会心理领域，其《试谈柳宗元的行为动机心理思想》（1987年第2期）一文的发表与《柳宗元社会心理思想研究》（1989年9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专著的出版，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20世纪80年代柳学研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五 关于柳宗元于永州的行迹考释及近几年的发展动态

柳宗元一生中流传下来的诗文、信札不少，其中绝大部分系属在永期间所著。因此，对柳宗元在永期的行迹及作品进行考释，对深入研究柳宗元的社会思想与文化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于此，龙震球先生的《柳宗元永州行迹考释》（1981年第2期）、陈雁谷先生的《〈永州九记〉旧址考及有关词语浅析》（1981年第2期）、何书置先生的《柳宗元永州十年纪略》（1981年第2期）《春风无限潇湘意——柳宗元在永州的交往录》（1997年第3期）《贬永作品知多少——柳宗元永州时期作品系年略考》（1988年第1、4期，1989年第2期）等文章，对柳宗元于永州期间的行迹、作品进行了良好的资料性的归整。这无疑是为后来的研究工作铺平道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柳学研究甚为活跃，其主要标志有二，其一是杜方智、林克屏主编的《柳宗元在永州》一书列入中州古籍出版社“学人独语书系”出版发行。该书由马积高先生作序，文中写道：“……永州之名播于遐迩，却与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有密切关系”。关于此说，最早见于南宋文学家汪藻于《永州柳先生祠堂记》一文，文中提到：“先生以永贞元年冬自尚书郎出为邵州刺史，道贬永州司马，至元和九年诏追赴都，复出为柳州刺史。盖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必曰先生……零陵徒以先生之故，遂名闻天下。”全书共收录论文19篇。分别对柳宗元被贬永州前的思想和生活、柳宗元来永州后的生活，以及柳宗元的哲学、政治、教育、经济、宗教、伦理、诗文等方面进行了专题探讨，在附录中分别对“柳宗元在永州年谱”、“柳宗元在永州行踪”、“八愚遗址”进行了辨识和考证。其二是何书置先生积十年之心血而成的《柳宗元研究》一书由岳麓书社出版，该书作者何书置先生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检阅和实地考察，对柳学研究中所存在的444个问题进行了梳理，对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了作者的一己之见。这两本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永州柳学研究工作已进入到了一种鼎盛时期，并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尔后，永州柳学研究加强了与外界的交流与交往，其主要表现，我刊开辟的“柳宗元研究”专栏不再局限于以永州学人的研究成果，更多的目光放在全国各地的柳学动态上，从而网络了一大批柳学专家，并大量地刊发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柳学考据文章。如陕西周庆义教授的《柳宗元家世与籍贯考》（1996年第3期），日本户崎哲彦的《柳宗元生卒时间辨》（1997年第1期），湖南省社科院张铁夫研究员的《柳宗元〈龙马图赞〉考释》（1997年第3期），金仁的《〈滴龙说〉与〈河间传〉钩沉——兼与卞孝萱先生商榷》（1998年第1期），谢汉强先生的《柳宗元诗文注释中有关柳州地理订正》（1996年第4期）及《“河东解人”与“邑居虞乡”是统一的——柳宗元祖籍小考》（1998年第2期），刘光裕教授的《柳宗元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1999年第1期），王—民先生的《试论柳宗元〈王叔文母刘氏志文〉》（1999年第

4期)等文章。对柳学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辨伪与考证,促进了永州柳学的发展。

20余年来,柳学研究尽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但是,如何发扬光大,如何将柳学研究深入下去,目前依旧问题多多。王一民先生在《当前柳学研究面临的三大课题》(2000年第2期)一文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王一民先生认为:其一,柳学的基本问题还要重新探讨;其二,近年柳学研究本身也略有不足;其三,要明确今后柳学研究的重点。王老先生对1993年到1997年大陆的出版和发表的柳学研究成果经过统计与分析,发现短论较多,而系统、完整、全面的论述还有待加强,因此,王老提出:“当务之急,还是要以给柳学打好扎实基础为主,根基牢固才能使人不再有摇摇晃晃不放心的感觉。”王老的话可谓是肺腑之言,值得柳学专家们深思。

进入新的千年,永州柳学研究任重道远。如何迈向新的境地,是永州人民和所有柳学专家所至为关心的问题。不过,永州柳学在“柳宗元研究”专栏的带动下,由一棵小苗日渐成长一棵于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大树,尤其是最近的这几年来里,其频繁的活动、厚实的基础、求实的精神,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九十高龄的陈雁谷老先生于世纪之交的时刻,向我们推出了他的第二部新著《柳宗元旅游思想研究》(香港新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柳宗元于《零陵三亭记》中写道:“邑之有观游者,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爽,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陈老从柳宗元的“观游”是“为政之具”的论断出发,大胆推出《柳宗元旅游思想研究》这一成果,又开辟了柳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尔后,于2004年12月,陈老的第三部著作《徐霞客、柳宗元研究论文集》于珠海出版社出版,搜集了他几十年来于徐学、柳学两方面的重要成果。

二是在杜方智、蔡自新、陈松柏、吕国康、翟满桂等人的努力下,相继成立了零陵学院柳宗元研究所、永州市柳宗元研究会,以《零陵学院学报》为依托,创办了《永州柳学》,并于2002年8月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永州国际柳宗元学术研讨会”。至此,永州柳学研究再度出现高潮。翟满桂教授的《一代宗师柳宗元》一书于2002年由岳麓书社出版,尔后,由陈松柏、蔡自新主编的《柳宗元与永州山水》,吕国康、杨金砖主编的《柳宗元永州诗歌赏析》两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三部书获得了广大柳学爱好者的赞誉。2003年8月,刘继源老先生编著的《柳宗元诗文研究》,蔡自新先生主编的《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吕国康先生主编的《柳宗元诗文教与学》三书由广东珠海出版社出版。2004年12月,黄伯荣先生编著的《柳宗元永州山水散文鉴赏》一书由中华图书出版社出版。这些学术著作的相继面世,在永州大地上掀起了新一轮的柳学热潮,同时也促进了全国柳学的发展。

三是吴文治、卞孝萱、霍旭东、王国安等一批重量级的柳学专家应邀惠赠大作于“柳宗元研究”专栏,使“柳宗元研究”专栏在全国的影响日趋巨大。如吴文治先生的《柳宗元集的版本问题》一文在我刊的“柳宗元研究”专栏上刊出后,立即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并成为研究《柳宗元集》版本问题所必读的一篇重要文献。

四是海外学者的不断加盟,使“柳宗元研究”专栏更具生机。如台湾学者衣若芬博士的《潇湘文学与图绘中的柳宗元》,韩国黄理喜女士的《柳宗元游记散文中奇特形象的审美意义》等,从这些文章里不仅让我们了解到了域外柳学的研究状况,更让我们坚定了继续办好《柳宗元研究》这一栏目的信心。

总之,经过20余年的风雨历程和艰难跋涉,“柳宗元研究”专栏在全国已日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培养了一大群柳学爱好者,成为柳学研究者们所至为关注的一块园地,但在今后的日子里,如何将它办得更好,办成一个全国性的有影响的栏目,还有待进一步的努力。

杨金砖

(作者为湖南科技学院图书馆馆长,编审,原《零陵学院学报》主编)